

新编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规划教材

· 专业课系列 ·

人口 经济学

(第3版)

李仲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编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规划教材 · 专业课系列

人口经济学

(第3版)

李仲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为新兴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的系统研究成果，以系列论述和实证分析相交叉的形式，概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形成过程和人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说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和特点以及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研究方法；系统介绍了生育率和死亡率的经济理论，并对其转变的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概述了经济适度人口学说和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人口的数量、质量、迁移、投资等方面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研究人口变动的经济因素以及人口现象和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劳动力就业、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和世界人口经济等人口经济问题。就方法论而言，在论述人口经济学上采用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短期到长期，从静态到动态，从统计的实证分析到计量的经济分析等综合方法。

全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力求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在新兴的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供人口经济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学生和实际工作者学习参考。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口经济学/李仲生 著. —3 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8

(新编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规划教材·专业课系列)

ISBN 978-7-302-32224-5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人口经济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C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4557 号

责任编辑：张 颖 鲍 芳

封面设计：朱 迪

版式设计：牛艳敏

责任校对：成凤进

责任印制：何 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课 件 下 载：<http://www.tup.com.cn>, 010-62794504

印 装 者：北京国马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27 字 数：639 千字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3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500

定 价：45.00 元

产品编号：050027-01

作 者 简 介

李仲生，男，1951年出生于北京。日本千叶大学经济学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致公党中央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人生科学讲演团副团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商业经济应用与管理研究分会理事、中国经济专家网理事、日本国际亚洲文化学会亚洲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科特约研究员。

长期从事人口经济学研究，出版专著9部、合著2部，代表作日文专著《中国的人口变动——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在2002年荣获首届日本“华人学术奖”。日本人口学会高度评价了这部学术专著，国内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等数十家媒体和部门报道他的研究成果。回国后主持教育部留学基金项目“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研究，该研究成果2004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前线》杂志以及《欧美同学会通讯》等都为此作了书评。专著《人口经济学》在2007年荣获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第四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人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等140余篇，总研究成果800多万字。其留学经历及拼搏精神自大型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之我的太阳》播出后，在国内引起轰动，感动和震撼了亿万观众，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日本富士电视台和美国侨报等数百家中外媒体进行过报道。传记著作《没有播出的故事——半生博士梦》作为畅销书在中国、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发行，有较大的社会影响。2001年成为《北京青年报》跟踪报道过的年度新闻人物，2002年被中国人生科学学会推荐为“中国人生科学”讲演团副团长。其奋斗精神和学术研究还受到国外关注，2005年5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教授接见了李仲生，并表示把李仲生的科研成果介绍给芝加哥大学和他的学生们。日本人口学会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也报道了其研究成果。传略和学术贡献被《世界名人录》、《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以及《伟大的复兴——中国优秀经济学家篇》（全国共88名优秀经济学家，人民画报社，2003年）等30余部辞书收集入典。

前　　言

本书所涉及的科学领域主要是新兴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其研究范畴侧重于人口的数量、质量、转变、迁移、投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研究人口变动的经济因素以及人口现象和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等，是以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分析作为研究对象的。

全书共分 16 章，前 14 章阐述了各种人口经济学理论，后两章则主要论述人口经济问题。第 1 章概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形成过程，说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和特点以及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研究方法。第 2 章主要叙述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派、马尔萨斯主义、庸俗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经济学派以及凯恩斯学派等的人口经济理论，并作简要的评述。第 3 章主要从微观人口经济学角度介绍生育率的经济理论，阐述对孩子质量的选择、生育率的经济决策和经济分析。第 4 章论述死亡率转变的经济理论、死亡水平的基本模式——生命表及死亡率转变的经济因素。第 5~14 章涉及宏观人口经济学的问题较多，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增长与消费积累、储蓄投资；经济适度人口学说；人口质量与劳动力素质、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与劳动力资源、充分就业与劳动力资源开发；人口投资与经济效益；人口分布的一般理论、人口迁移的经济模式、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转变的模式与类型，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说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等。第 15 章和第 16 章则分别用时期序列分析的方法论述中国和世界的人口经济发展。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短期到长期，从静态到动态，从统计的实证分析到计量的经济分析的不同方式和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在西方人口经济学中也是常见的。就其方法论而言，不但对若干人口经济问题进行假说的分析和理论的分析，而且重视利用统计的、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人口经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有独到之处。

本书在同类著作中力求新颖和多样化。在论述人口经济问题时概括了人口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人口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同时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最新人口经济学理论成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尤其突出的是利用人口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世界和中国的人口经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案例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另外，不少章节的结构形式力求新颖，如第 4 章死亡率转变的经济理论和生命表分析中，运用死亡率转变的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手法对死亡率转变的经济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本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概括地说，主要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阐明人口经济运动过程中人口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即人口经济规律。在人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就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言，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

在本书的审稿和再版过程中，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此特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李仲生

再 版 前 言

自 18 世纪后半叶以来，人口经济问题始终受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关注。但是，可以说人口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人口学和经济学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分支学科，尽管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但发展较快，80 年代是人口经济学的体系化时期，90 年代以后，随着具有创新性人口经济研究论著的不断出现，使人口经济学的学科领域进一步趋向成熟化。但进入 21 世纪以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比较沉寂。正因为这样，作者在 2006 年撰写了《人口经济学》一书，考虑到《人口经济学》前两版的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不够新颖，在广泛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先进成果的同时，本着科学、创新、求实的态度，升级了这本《人口经济学》(第 3 版)。

本书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借鉴了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这次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出于篇幅的考虑，割舍一些内容。把第 2 版中第 3 章、第 7 章、第 9 章和第 11 章的附录内容全部删除，包括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经济因素、欧盟的就业与失业、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与海外移民以及日本的老龄化与对策等。删除了第 15 章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控制的经济效益以及第 16 章世界的人口经济发展中的当代转轨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等内容。

②增加了第 6 章经济适度人口学说和第 10 章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将《人口经济学》(第 2 版)的 14 章扩充为 16 章；增加了第 2 章的大部分内容，包括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庸俗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南亮三郎学派、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人口经济学说，增加了第 1 章、第 3 章、第 8 章、第 11 章和第 15 章的部分内容。

③适应现实的需要，对一些章节作了修改。对第 16 章世界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增加了 2010—2012 年的世界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的内容，尤其是对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的预测。本章图表也加入了大量近年来的新数据，并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修正。

在本书的审稿和再出版过程中，得到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大力帮助，还要感谢为本书再版排版、印刷的老师们付出的辛苦劳动，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李仲生

目 录

第1章 新兴的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	1
1.1 近代人口经济学说的源流	1
1.2 当代人口经济学说的形成过程	3
1.3 人口经济学说的确立与发展	6
1.4 人口经济学的概念与研究范畴	8
1.5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0
第2章 人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14
2.1 重商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	14
2.2 重农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	17
2.3 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20
2.4 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学说	24
2.5 庸俗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28
2.6 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经济学说	30
2.7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35
2.8 凯恩斯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37
2.9 南亮三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39
2.10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经济学说	43
2.11 乐观主义的人口经济学说	63
第3章 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与分析	80
3.1 生育率的经济理论	80
3.2 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需求	91
3.3 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选择	94
3.4 生育的经济决策	97
3.5 生育的经济分析	99
第4章 死亡率转变的经济理论、分析与生命表	103
4.1 死亡率转变的经济理论	103
4.2 死亡水平的基本模式生命表	106
4.3 从生命表来观察死亡水平	111
4.3.1 平均预期寿命/ e_x^0 水平的变化	111

4.3.2 死亡人数/ d_x 曲线的变化	113
4.3.3 死亡概率 q_x 曲线的变化	114
4.4 影响死亡率转变的经济因素	116
第5章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120
5.1 人口增长与消费、积累	120
5.2 人口增长与储蓄、投资	121
5.3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122
5.3.1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论	122
5.3.2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30
5.4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率	132
5.5 经济发展的人口压力	135
第6章 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138
6.1 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的思想渊源	138
6.2 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139
6.3 现代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144
6.4 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发展及评论	158
第7章 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	160
7.1 人口质量	160
7.2 人口质量与劳动力素质	162
7.3 人口质量与科技进步	164
7.4 人口质量与经济的发展	165
附录 美国的国际人才竞争策略、诺贝尔奖与经济发展	168
第8章 人口与劳动力就业	175
8.1 人口与劳动力资源	175
8.2 人口与劳动力	176
8.2.1 人口规模与劳动力供给规模	176
8.2.2 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结构	177
8.3 就业理论的发展	180
8.3.1 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	180
8.3.2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	182
8.3.3 菲利浦斯曲线与货币学派的自然失业率假说	183
8.3.4 供给学派的就业理论	186
8.3.5 理性预期学派的就业理论	188
8.3.6 新古典综合派的就业理论	191
8.4 劳动力就业	192

8.5 劳动力资源开发	198
8.6 就业政策与充分就业	206
第 9 章 人口投资与经济效益	212
9.1 人口投资	212
9.2 家庭人口投资	213
9.3 人口投资的转化	214
9.3.1 人口投资的转化形式	214
9.3.2 人口投资的转化	216
9.4 人口投资的经济效益	217
第 10 章 人力资本理论	221
10.1 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	221
10.2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222
10.3 当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发展	230
10.4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234
10.4.1 人力资本	234
10.4.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235
第 11 章 人口分布、迁移与经济发展	237
11.1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	237
11.1.1 人口分布	237
11.1.2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	238
11.2 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密度	239
11.3 人口迁移	241
11.4 人口迁移的经济模式	243
11.5 人口迁移的经济效益	252
11.6 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	254
第 12 章 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	258
12.1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转变的模式	258
12.2 人口转变的类型	262
12.2.1 人口转变的欧洲类型	262
12.2.2 人口转变的日本类型	264
12.2.3 中国的人口转变类型	266
12.3 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70
第 13 章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274
13.1 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274
13.2 劳动生产率与人口老龄化	277

13.3 人口老龄化与国民收入分配	279
13.4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投资	280
13.5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	281
13.6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282
第 14 章 人口与资源、环境	286
14.1 人口与资源	286
14.1.1 人口与资源的关系	286
14.1.2 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	287
14.1.3 人口增长与粮食	290
14.1.4 人口与土地资源	295
14.1.5 人口与森林资源	297
14.1.6 人口与淡水资源	299
14.1.7 人口与矿产资源、能源	301
14.1.8 人口增长对资源的影响	304
14.2 人口与环境	305
14.2.1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	305
14.2.2 人口、经济发展与环境危机	306
14.3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308
14.4 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311
14.4.1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311
14.4.2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312
14.4.3 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313
第 15 章 中国的人口经济发展	318
15.1 近代的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	318
15.2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319
15.3 改革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	324
15.3.1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324
15.3.2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327
15.4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329
15.5 当代的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因素	337
15.5.1 当代的中国经济发展	337
15.5.2 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因素	341
第 16 章 世界的人口经济发展	344
16.1 近代的人口、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344
16.2 现代的人口与经济发展	357

16.2.1	发达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发展	358
16.2.2	苏联的人口与经济发展	369
16.2.3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发展	370
16.3	战后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371
16.3.1	战后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371
16.3.2	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378
16.3.3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380
16.4	当代的人口经济发展	382
16.4.1	当代发达国家的人口经济发展	382
16.4.2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经济发展	396
	参考文献	407

第 1 章

新兴的边缘学科——

人口经济学

1.1 近代人口经济学说的源流

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诞生的。不过，由于人口经济问题的历史久远性，经济学家对人口经济学的探讨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早期重商主义者乔万尼·保泰罗(Giovanni Botero, 1540—1607)是第一个论述人口经济学说的人。他的人口经济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城市论》(1588)与《国政论》(1589)两部著作中。他在论述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人口规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和力量的重要源泉。因为有了众多的人口，不但意味着拥有充足的兵源，而且具有足够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人口越多，对国家越有利。其理由是，人口增长意味着军事力量的增强，税收的增多，通过贸易获得更多的金钱，进而通过开垦土地使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增加。随后，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 1571—1641)在《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1621)一书中，阐明了他的人口经济思想。他认为要拓展有利于英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各种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而需要更多的人口，以增加国民财富。他指出，在对外商战中，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劳动力就越多，可以输出换回金银的商品也就越多，因此，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法国的重商主义者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o, 1619—1683)在论述法国人口经济问题时指出，法国当时的富裕与强大与法国拥有众多的人口是密切相关的。相比欧洲各国，法国的人口居欧洲第一位。所以柯尔培尔倾向法国人口继续增加。在柯尔培尔看来，人口众多既有利于发展工场手工业，又可以促进法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使更多的硬通货通过贸易顺差源源不断流入法国，从而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而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德哈姆·斯图亚特(James Denham Steuart, 1712—1780)则在 1767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中主张增加人口，并强调人口会带来许多经济上的效益。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的多寡，由该国或地区所拥有的金银等贵金属的数量来衡量，要获得更多的金银，就必须扩大出口贸易，而要增加出口贸易量，就需要更多的劳动者从事劳动生产，而且人口和金银又是建立军备和巩固国防的要素。乔万尼·保泰罗、托马斯·曼



等重商主义者在16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先后提出了朴素的人口经济思想,使人口经济学说进入了萌芽时期。

17世纪末期以后,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Boisguillebert, 1646—1714)、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 1680—1734)、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以及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等人也先后论述了他们的人口经济思想。其中,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尤其引人注目。他从重农主义观点出发,提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并强调人口是财富的第一个创造性因素。他认为财富的增长先于人口增长,只有财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长,一国人口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由于收入能够提供富裕的生活和利益,因而促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当然,人口过多或者无限制的增长对一个国家也是不利的。他揭示了人口变化与财富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人口、需求、分工、交换等因素之间的联系。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在其1705年出版的《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中,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真正源泉,而一国的财富和其国土的肥沃成正比例关系,土地则是供给人口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来源。同时,他明确地反对法国重商主义压低粮食价格以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主张,并指出这是法国农业衰退、农村人口缩减的最根本原因。而理查德·坎蒂隆论述了贸易与人口变动的关系。他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并希望制造业贸易实现顺差。这种顺差有两种情况,其中之一是输出低级产品,获得顺差而变富,但要付出人口减少的代价。这一时期,重农主义的人口经济学说对处于萌芽时期的人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真正的人口经济学说的研究是从古典经济学派开始的。古典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最先分析了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观点,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是指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同时他提出,经济发展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准的增长,通过“分工的利益”影响劳动生产性。他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曾明确地指出:“就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的标志是居民人数的增长。”^[1]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指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而言是以收获递减法则作用为前提,随着投入一定土地的人口增加,由于土地集约的耕作和优良地向劣等地的移转,因而增加资本并不能提高生产率,反而使报酬呈现减退的倾向。即使生产超过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能永远持续稳定地增长。“是因为人口增长常常是持续的,而土地的数量有限,质量又有差异,在土地上按照比例关系投入资本的各种增加部分使生产率减退”^[2],从而产生了人口压力。法国古典经济学派集大成者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 de Sismondi, 1773—1842)则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中指出:“财富和人口并不是国家繁荣的绝对标志;国家繁荣的标志在于财富和人口的比例。”^[3]他认为,人的消费需要生活资料来满足,因而消费资料决定着人口的增减。如果在社会安定且有充足的生活资料的情况下,可促进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增长之所以缓慢,是因为受到了生活资料的限制。由于生活资料是靠人们的收入来购买的,西斯蒙第认为人口是由收入来调节的,为了使人们生活幸福,最重要的是使人口随着收入的变

化而增减。西斯蒙第认为人口与消费、收入及生产是相互关联的，互为因果。总之，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问题，从而使人口论在经济学中开始获得一定地位。

古典经济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第一个把人口经济问题当作专著来讨论和著述的经济学家，他以《人口原理》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作者而出名，特别是作为人口学家享有最高的地位，被西方誉为“人口学之父”。他把人口经济问题开辟为一个专门领域，尽管他的思想是在总结众多前人人口思想和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他在人口经济学说上的贡献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1798年他发表《人口原理》，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两个级数的假说，把人口过剩的原因归结为食物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而食物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是由于收获递减规律的作用，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还揭示了人口受经济抑制的消极作用和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有着内在的联系，从两者的结合上理论地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的动态过程，尤其是人口对经济起积极作用的增殖原理，作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成了其理论的核心。正是在了解了人口作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变量在经济中所占位置的情况下看到了人口经济学的雏形，对后来的人口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古典学派的巨匠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在18世纪末就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研究，颇引人注目。他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强调，在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关系上，人口既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又有消极作用的一面。马歇尔在谈到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人口增长一方面推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马歇尔看来，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进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人口素质。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劳动力人口的要求不断提高，这种提高主要体现在保证适应于经济发展的人口质量的水平上实现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人口质量的要求远胜于对人口数量的要求，这种人口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马歇尔的人口经济思想是以资本主义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他探讨了人口增长通过劳动力人口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作用于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论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时主要强调了积极的因素。这种研究对人口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孕育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济学家对人口经济问题的关心有所减弱，其主要原因是所谓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的中心转为短期理论，欧美各国出生率的下降和一部分西欧国家的人口转变，使人们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学说进一步抱有怀疑的态度，而取代它的新人口理论又未能成功地建立起来，因而，西方人口经济学说的研究开始进入停滞的时代。

1.2 当代人口经济学说的形成过程

进入20世纪以后，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的发展。西方学者最先系统地提出经济适度人口观点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 1861—1935)，瑞典经济

学家克努特·威克塞尔(Johan G.Knut Wicksell, 1851—1926)。而埃德温·坎南在1914年出版的《财富论》和1929年出版的《经济理论评论》等著作中，逐步完善了自己的经济适度人口理论。埃德温·坎南在1914年所著的《财富论》中明确地指出，达到产业最大收益(或劳动生产率)的人口，就是报酬最大点人口，实际上是经济适度人口。这个经济适度人口的位置将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的进步和其他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因此，经济适度人口应从长期的和宏观的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变化来把握和考察。克努特·威克塞尔被认为是最先把边际分析引进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他除了最先提出“适度人口”这个概念外，还澄清了适度人口与最大限度人口的本质区别。

早期西方人口经济学说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以经济适度人口学说和人口适度密度理论而告终结。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40年代是人口经济学的创建时期。以凯恩斯学派的人口经济理论为开端，形成了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说。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说是随着当代西方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近代的西方人口经济学说相比，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说所涉及的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对人口经济关系的理论阐述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如前所述，如果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学说主要是对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长期趋势的考察，主要讨论经济对人口增长的制约作用。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凯恩斯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则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从短期去分析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以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开端，讨论了人口增长对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促进自发投资的作用。到了1937年，他发表的《人口缩减的若干经济后果》一文中则展开了短期的动态分析。他认为，人口增长由于促进投资而促使经济成长，把人口增长率视为通过有效需求源泉的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此同时，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哈维·汉森(Alvin Harvey Hansen, 1887—1975)在1936年发表的《经济进步与人口衰减》和1940年发表的《外延的扩张与人口增长》等论文中，更明确地把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归结为人口增长的长期停滞，其观点被称为“经济长期停滞论”。后来，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 1900—1978)在《论动态经济学》中论证了长期动态理论，人口增长不仅仅是扩大了消费，还增大雇用，使投资规模扩大。现实的成长率显著地越过适度成长率，由此产生长期的景气。换句话说，投资和消费的增大作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凯恩斯学派的继承者们把他的这种理论长期化、动态化，讨论人口增长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人口经济学说相比又有了新的发展，不过凯恩斯学派阐述的是宏观人口经济学学说，后来他们有关人口经济问题的理论成为现代西方宏观人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布赖恩·雷德韦(William Brian Reddaway, 1913—)在1939年首先提出了人口经济学^[4]的命题，发表了《减少人口经济学》，对降低人口增长率所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约翰·斯彭格勒(Joseph John Spengler, 1903—)发表《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一文，也正式使用人口经济学的命题，并对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做了概述性的分析。从此，一批专门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术论文和论著相继问世。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后期，欧美大多数经济学家从宏观人口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of population)角度考察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01—1985)在1952年撰写的《人口增长及有关经济变量的长期波动》一文，把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的波动关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创立了“人口经济增长波动”理论。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 1898—1990)在1952年出版的《人口通论》中阐述了经济适度理论。索维所说的经济适度人口是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最高生活水平的，即最高的按人平均产量和收入的人口，也就是获得最大经济福利的人口。他通过考察人口规模变动和经济进步的关系，建立了经济适度人口模型。在实际分析中，他把边际生产率和人均生活水平最高点的人口看做经济适度人口，以人均产值最大化为目标。安斯利·J.科尓(Ansley J.Coale)和埃德加·M.胡佛(Edger M.Hoover)在1958年出版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关于印度前景的研究》一书中，以印度的人口与经济为例，对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科尓和胡佛着重考察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说明人口增长过快对现在和未来人均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 1926—)依据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长波理论来研究美国的人口经济增长长波。他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如《美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长波：论历史格局的一些发现》(1965)、《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的长波：美国的经验》(1968)等。一些经济学者从人口增长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如西奥多·威廉·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 1902—1998)在1961年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一文，提出人力资本的投资就是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口质量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 1915—)在1962年撰写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我们面临的选择》，则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考察问题，他的观点也颇有创新性，对人口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在微观人口经济学(micro-economics of population)方面，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 1922—1994)在1957年发表的《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一书，首先提出了家庭规模的成本—效益理论，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经济模型，并考察了家庭的生育决策，为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途径。此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 1930—)在1960年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他从微观经济学视野出发，运用消费者选择理论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把孩子看做耐用消费品，并论证了孩子的数量成本与质量成本的可替代性，以及家庭收入和父母行为对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这一理论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并不新颖，但是因为它被用于生育率的分析，因而引起了许多经济学者的关注。1965年，贝克尔又发表了一篇崭新的论文《时间分配理论》。这是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另一种家庭经济行为选择的理论，它开辟了生育率研究的新领域。贝克尔的这些理论在近30多年间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作为人口经济学领域的生育率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fertility)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此外，保罗·T.舒尔茨(Paul T.Schultz, 1940—)在1969年发表的《家庭计划和生育率的一个经济模型》对生育率经济学的发展也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的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大都从西方消费需求理论出发，把孩子看做“耐用消费品”去分析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新家庭经济学者们应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进行研究，提出了家庭经济学的孩子成本与收益、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以及孩子数量质量替

代理论等学说，使微观人口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分析，成为这个时期西方人口经济理论研究的主流，这样，西方微观人口经济体系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1.3 人口经济学说的确立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是人口经济学的体系化时期。1972年，约瑟夫·约翰·斯彭格勒出版了《人口经济学》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人口经济学的概念和内容，使其成为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奥多·威廉·舒尔茨在1973年撰写了《家庭经济学》一书。舒尔茨和其他经济学家运用人力资本和时间配置的概念从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对家庭生育行为进行了广泛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家庭生产函数和把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实体单位，说明这个决策实体单位为了实现当前的消费和孩子投资之间的均衡，在进行家庭生产时要配置其稀缺资源。1974年，日本经济学家大渊宽出版了《人口过程的经济分析》，系统地论述了人类历史上人口变动的过程以及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977年，朱利安·林肯·西蒙(Julian Lincoln Simon)撰写的《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阐述了人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诸方面的关系，如对人口与工农业的发展、人口与国民收入、人口与自然资源等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说明了发展中国家节制生育计划的成本——收益的决策问题。同年，日本经济学家安川正彬发表了《人口经济学》一书，日本经济学家大渊宽、加藤寿延等经济学家也出版了《人口经济论》一书，这两部专著的出版丰富了人口经济学领域的研究。1981年，保罗·T.舒尔茨出版了《人口经济学》一书，日本经济学家大渊宽、森冈仁又出版了《经济人口学》(1981)一书，使人口经济学领域进一步趋向体系化。

与此同时，在欧美各国的一些大学中开设了有关人口经济学的课程。此外，国际人口学会在1973年的列日大会和1978年的赫尔辛基专门会议上设置了以人口经济学命名的部门会议，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人口经济学作为体系化的新兴学科正式被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针对世界经济发展趋缓，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开始盛行，西方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控制人口增长的分析，已经从“人口—粮食”、“人口—土地负载能力”等模型，推进到“人口—资源”和“人口—生态环境”等模型。当时一些鼓吹控制人口增长的经济学说相继问世，美国人类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奇(Paul R. Ehrlich)和安妮·H.埃利奇(Anne H. Ehrlich)在1968年发表了《人口爆炸》一书，1970年又出版了《人口、资源、环境》一书，G.泰勒(G.Taylor)在1970年发表了《世界末日》一书。他们都认为当今人口与经济正急剧恶化，世界已经不能供养迅猛增长的人口，变本加厉地把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悲观结论推向极端。在这种悲观主义的思潮中，以罗马俱乐部委托丹尼斯·L.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等人撰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最为突出。梅多斯等人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成世界经济模型，他们指出：如果人口、工业化、污染、食物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增长趋势保持不变，世界将在百年内达到增长极限。他们探讨了土地、粮食供给、自然资源、能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指出这些投入最终是有限的，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只有停止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才能避免“世界末日”的来临。梅多斯等人的观点得到许多人口经济学家的关注，值得